

针对新生家长发帖求“支招”希望让孩子进入“好班”现象,教育专家指出 与其搭保护圈,不如教孩子迎挑战

据文汇报 开学在即,不少新生家长在网上发帖求“支招”:如何帮助孩子进入一个“好班”。有的家长甚至为此绞尽脑汁,到处找人打探消息、托关系、求照顾。

这样的“努力”真有用吗?记者就此采访多位教育界人士,不少人给这样的家长“泼冷水”——与其指望通过这样的动作“帮”孩子,不如把时间、精力放在帮孩子科学做好开学准备上,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未知挑战。

什么是家长眼中的“好班”? 答案并不一致

对小学而言,“均衡编班”“平行分班”早已不是新名词,可每当新学期来临时,总有不少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期望在开学前“动动脑筋”,看看能否通过“运作”让自家娃去所谓的“好班”。

什么是家长眼中的“好班”?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家长,发现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有家长认为,“好班”主要看班主任的能力,最好是年级组长、特级教师带的班;也有人说,最好语、数、英老师经验丰富、年富力强;还有家长希望,最好老师们年轻有活力,讨孩子喜欢……各种臆想最终汇聚成一句:“帮我们进个好班!”

开学即将升入二年级的小怡(化名)就读于市中心一所公办小学。一

年前的暑假,为让小怡进个“好班”,她的妈妈特意精心为小怡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份简历,还想办法托“中间人”打招呼。一页A4纸上,除了小怡父母“光鲜”的家庭信息,还写满了芭蕾舞、围棋、钢琴、书法、绘画、古诗词等诸多小怡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可时至今日,小怡妈妈也无法明确,女儿所在的这个班究竟是不是传说中的“好班”。因为从头到尾也没到过“中间人”的肯定回复。但一年读下来,小怡感觉班主任老师挺不错,对其他任课老师也都挺喜欢,同学间的氛围也不错。

小怡妈妈坦言,自己也明白教育均衡发展道理,但真轮到自己女儿,还是想努力一下。“如果孩子进了好班,有好老师带着,有好同学陪着,那无论是学习氛围还是身心发展,都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小怡妈妈的这番话,道出不少家长的心声。

可在实际操作层面,类似的“招呼”往往无法起到家长期望的效果。一位知名公办小学校长告诉记者,每年总有不少新生家长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学校的老师、中层乃至校领导,面对这些家长挑班、挑老师的“要求”,他们往往也就应承一下。“起初大家也会解释说小学是均衡分班的,老师搭配是相对均衡的,但总有家长想突破原则,于是有时只能靠‘话术’来安抚他

们。比如,年级组长除了当班主任,通常还会带两三个班,那这几个班就统是年级组长班。”

师资“强弱搭配”,学生分布也讲究均衡

事实上,对公办小学和初中,分班通常的做法就是均衡分配,将学生和教师均匀分配到各个班级。师资配备上,如果这个班的班主任比较有经验,那另外几门学科就会搭配相对年轻、资历浅些的任课老师,反之,如果班主任很年轻,搭配的任课老师往往就会更有经验,并不会出现把最好的老师都集中在某班的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黄浦实验小学校长王平告诉记者,考虑到一年级孩子在“幼升小”的衔接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适应和调整的问题,学校特意配备了一批既有亲和力和青春活力,又拥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青年教师,帮助新生度过学习准备期。

同时,在语、数、英等主要学科中,学校也会根据教师的教龄和教学经验等实际情况,将任课教师进行统筹搭配。举个例子,若语文老师为职业初期阶段的教师,那一般情况下则会配备有一定经验的数学、英语教师,力求科学有效地确保各班的教学质量及教育公平。

在尽可能保持师资均衡的同时,学校也很注意生源分布的均衡。比如,在今年的录取新生中,既有“人户一致”“人户分离”的学生,也有来自外省市的学生,学校均按一定比例平均分配给各班。“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尽可能让各班男女比例保持一致,并根据部分学生的年龄差异进行精细化调整。考虑到部分7、8月份出生的儿童生长发育较前一年9、10月出生的孩子可能有差异,我们对此类学生也进行了各班的平均分配,确保各班都能充分关注到这些年龄较小的学生。”王平表示,部分家长在分班问题上有所焦虑可以理解,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开学后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调动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和内驱力。

“理科班”不适合所有人,要相信学校的安排

当孩子从初中来到高中,不少家长又有新的担忧。有人直言:“新学校有理科班、实验班,通常这些特色班抓得更紧,学得更深,有没有可能把孩子往里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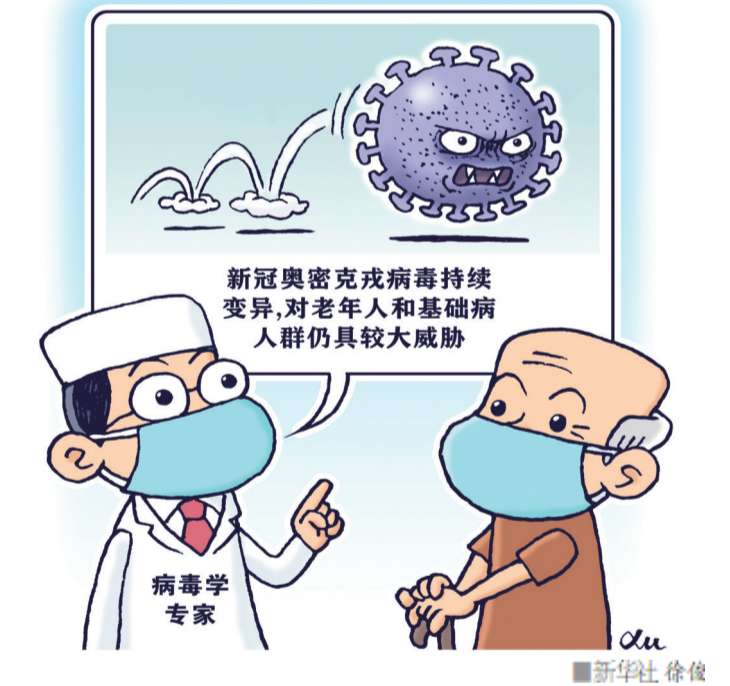
对此,有着多年高中管理经验的闵行区教育局局长何美龙坦言,高中阶段,在实验性示范性学校里分几个理科实验班,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把层次差异太大的学生分在一个实验

班里,老师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对不擅长数理化的学生而言更是“痛苦万分”。就语文和英语等科目,知识能力进阶的途径不存在数理一样的逻辑层级,在普通班不会影响语文、英语的学习。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对今年高一新生的分班更特别。钱学森班、北外实验班、日语实验班、文创班……近一半的班级有各自的“努力方向”,而学生要进入这些特色班,不用参加分班考,也不按成绩“一刀切”,而是让新生通过志愿报名的形式牵手心仪的班级。在现有教育环境下,学校希望尽最大可能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

在何美龙看来,这些年,很多家长因“内卷”而多虑,忙着找人脉、托关系,给孩子选好老师、好班级,尽力想给孩子搭建“保护圈”、构建“安全圈”。但这些家长恰恰忘记了,学会面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新挑战,才是磨砺孩子最本真的成长力。

“等孩子真正步入社会,可以按照志向来选择职业,但没办法选择同事,更不可能选择领导。要在学校选这选那,本身就削弱了学生在社会中成长的过程和教育的社会意义。作为家长,要相信学校是专业的,也要相信,自己遇到的,都会是最好的。”何美龙说。 ■王星



脑计划一重大项目在沪启动

探索适合中国人群的抑郁症管理模式,为患者寻求更优治疗

据文汇报 近期,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首批项目陆续启动,向脑科学最前沿领域发起重量级攻势。其中,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牵头的“抑郁症的前瞻性临床队列研究”重大项目之“真实世界的多中心、前瞻性抑郁症专病队列”项目近日正式启动,将探索适合中国人群的抑郁症管理模式,为9500多万抑郁症患者寻求更优治疗。

该项目基于25家国内一流临床研究单位,借助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神经影像平台、临床数据标准化嵌入式采集软件、多模态信息系统等国际领先平台设施,将建立多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大规模的专病队列。

中国脑计划项目是一个历时15年的计划(2016-2030年),其中,围绕抑郁障碍的研究在国家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项目中占据重要比重。抑郁症是一个全球范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最新调查显示,抑郁症的终身患病率为6.9%,目前我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给社会、家庭及个人带来了沉重负担。

“抑郁症是一种异质性高的重性精神疾病,自杀风险高,复发率高。真实世界中抑郁症疾病发展轨迹仍不清楚,治疗方案复杂多样,何种治疗更为有效不得而知。”该项目主要负责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彭代辉介绍,此次的研究拟开展大规模专病队列研究,覆盖抑郁症的各个阶段,描绘疾病发展轨迹,探索适合中国人群的抑郁症管理模式。

时至今日,抑郁症治疗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医生主观经验,疗效预测和风险预警均缺乏客观的生物标

志物。此次的研究将响应中国脑计划“一体两翼”战略,在研究中转化应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剖析疾病危险因素,构建模型并验证推广,弥补疾病远期结局预测的研究空白。

作为项目牵头单位代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赵敏教授表示,抑郁症的前瞻性临床队列研究重大项目对心境障碍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期待未来几年各方团结合作,在高质量完成项目的同时带动心境障碍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为我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和脑计划做出积极贡献。

还有专家谈到,该项目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加快中国抑郁症的研究进程,更对认识脑、预防脑疾病等具有重要意义,预期能减轻患者、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产生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唐闻佳

上海首批8个温室气体监测站点加速解锁“碳密码”

据解放日报 最近,沪太路洛川中路路口的上海国际新媒体产业基地悄然发生变化——100多米高的静安国煤中心楼顶,一座约10米高的监测塔在此竖起。

上海中心城区首个也是目前中心城区唯一的一个环境空气温室气体自动监测站点正式建成,也为上海首批8个温室气体监测站点建设画上圆满句号。强大的监测评估能力是一把“尺”,能精准“丈量”我们这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成效。以此为基础,上海解锁特大型城市“碳密码”的征程进入全面加速期。

珍惜每一股风

近日,记者在上海国际新媒体产业基地的最高处看到,温室气体监测塔上挂着两个“花洒”。“这是两个空气采集器,一个处于工作状态,另一个备

用。”静安区环境监测站站长王晓燕指着连接“花洒”的管线说,采集的大气样本经过滤,进入设在楼顶的监测室,在这个6平方米的空调间内,由精密的仪器通过光腔衰荡光谱法测出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浓度。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副主任刘启贞表示,常规污染物的监测主要关注排放浓度是否超标,而温室气体的监测更关注排放总量,要求能准确测定气体流量,这些因素相当考验监测的准确性,因此对大气样本采集时的环境要求相当苛刻。“首先,我们珍惜每一股风,风向、风速,还有其‘携带’的温室气体总量等信息都是钥匙。这些钥匙是将来锁定碳排放源的关键之一。”

这就要求采样口尽量远离地面,布设在距地面50米至100米的高度为宜,且周边水平面应保证360°的捕集

空间,同时,附近1公里范围内的土地使用状况相对稳定,没有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等干扰因素。刘启贞介绍,目前主流的监测点设置方式都是在平地上建监测塔,而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中心城区,平地起塔的可能性小,即使建起高塔,周边建筑物密集,附近会产生复杂的升降气流、涡动和绕流等现象,干扰采样环境,“因此花了很长时间寻觅中心城区的落脚点,最好是那种‘一览众山小’的高楼”。最终,上海国际新媒体产业基地被一眼看中,除了上述优势,该楼没有餐饮,且内部空气交换不依靠楼顶排气口,这些更进一步减少了对采样口的干扰。

建“天空地”网络

静安国煤站启用后,上海8个温室气体监测站点全部投入繁忙的监测工作。它们分别是嘉定外冈、宝山杨

行、静安国煤、青浦金泽、松江车墩、浦东张江、奉贤海湾7个温室气体监测站,以及1个位于崇明东滩的温室气体背景监测站。站点设置充分考虑了上海的地形地貌、气象等综合环境因素,以及能源结构、产业布局等社会经济特点,基本能实现对全市温室气体监测全覆盖。

刘启贞表示,这些站点中有两到三个站点是边界点,将重点监测上海与周边省市温室气体的“交换”;位于崇明东滩的背景站具有积极参照意义,可以给科研人员提供一个相对不受城市因素影响的纯粹样本;其余站点在各自照看所在区域温室气体特征的同时,还会紧盯区域内的温室气体工业源和道路移动源。

相对于PM2.5等常规污染物监测,碳监测技术的难点主要在于对监测数据的准确度要求非常高。一般情

况下,二氧化碳在环境中的实际浓度在40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左右,而根据相关国际标准,对背景空气二氧化碳的在线监测可比性要求为0.1ppm,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环境监测项目中对监测数据准确度要求最高的一类。为追求更精准的数据,8个温室气体监测站点还不够,上海正在建设大气温室气体“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除了固定站点外,移动监测车、无人机、卫星等都会加入这个网络。近期上海就将在工业区、电厂、交通枢纽、崇明东滩等10多个点位释放无人监测机,可抵达离地500米的空间,避免周围环境干扰。

另据透露,上海生态环境部门整合现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源排放清单数据来源,优化活动水平数据获取体系,已初步完成了上海2020年的碳污同源排放清单。 ■陈玺撼